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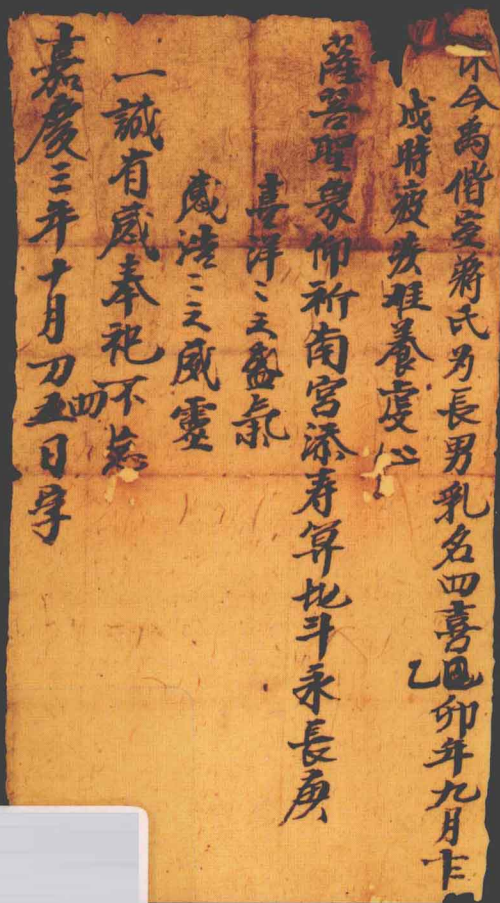
胡彬彬 李方 著

湖南大學出版社

長江流域民俗文化與藝術遺存

祈願延綿

佛
教
造
像
記



佛
教
造
像
記

祈願延綿

長江流域民俗文化與藝術遺存

胡彬彬 李方 著

湖南大學出版社

不今為僧室將氏為長男乳名四喜也卯年九月卞
成時疲疲鞋養虔心
隆聖聖象仰祈南宮添壽算此斗永長庚
喜洋三三盛氣
威德三三威靈
一誠有威奉祀不怠
嘉慶三年十月四日
字



内 容 简 介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长江流域民俗文化与艺术遗存』丛书之一。

本书以唐以降至清末长江流域地区的佛教造像记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置于我国唐、宋、元、明、清各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下，将长江流域不同区域间的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下的中国佛教造像记做出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书中列出近200多幅佛教造像记实物图片及释文，这些造像记均系作者20多年田野考察所得的珍贵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祈愿延绵 / 胡彬彬，李方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7

（长江流域民俗文化与艺术遗存）

ISBN 978-7-5667-0373-6

I. ①祈... II. ①胡... ②李... III. ①长江流域—佛教—造像—唐代~清代—图集

IV. ①K87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731号

长江流域民俗文化与艺术遗存

CHANGJIANG LIUYU MINSU WENHUA YU YISHU YICUN

祈愿延绵

QIYUAN YANMIAN

作 者：胡彬彬 李 方 著

责任编辑：胡建华

责任校对：全 健

责任印制：陈 燕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649149（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liyou0731@126.com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印 装：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6开 印张：11.75 字数：264千

版 次：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册

书 号：ISBN 978-7-5667-0373-6/K·77

定 价：148.00元

總序

胡彬彬

文明是指人類所創造的財富之總和，包括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文明與文化既有區別又有聯繫。文明是文化的一種實踐成果，是文化的物質及精神方面的表現，可以影響文化的改變；文化是一種觀念，是文明的基礎，可以決定文明的命運。并非所有的文化都能結出文明之果，但任何一種文明，都以與其相稱的文化為基礎。文化的變遷對文明的產生有很大的作用。

任何一個文明的興起壯大，都離不開水的滋養。例如，恒河滋養了印度文明，尼羅河滋養了埃及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滋養了小亞細亞文明，愛琴海滋養了希臘文明。中華文明也是如此。有學者指出：『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文明的起源問題。祇要對黃河、長江兩河流域文明的進程有個基本的了解，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①由於諸多歷史原因，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以來，史學界都曾達成一種偏見共識，認為祇有黃河滋養了中華文明。但是隨着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據的出現，長江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另一源頭，也越

來越得到廣泛認可。^②季羨林先生總結說：『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并駕齊驅。』^③甚至在很多方面，長江文明都要早於黃河文明。長江文明區域之廣，文化遺址數量之多、密度之大、出土文物之多，都堪稱世界之最。特別是長江文明中的『稻作文明』，給東亞及世界以很大影響。當然，我們也不是要將長江流域上昇到中華文明的第一發祥地，而是要說明中華文明的多元性、兼容性和統一性，『研究長江文化正是爲了向世界展示中華文明的這一特點』。^④

這條世界長度位居第三的大河，發源於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西南側，全長六千三百餘公里。幹流流經青海、西藏、四川、雲南、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上海十一個省級行政區域，於崇明島以東注入東海，自西而東，如一條巨龍蜿蜒曲折，奔騰於中國中部地區。數百條支流輻輳南北，延伸至貴州、甘肅、陝西、河南、廣西、廣東、浙江、福建八個

① 李伯謙：《長江流域文明的進程》，《考古與文物》，1997年4期。

② 范小平：《對長江文明的重新估價》，《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1期，第35-39頁；邱述學：《重構長江文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3期，第90-98頁。

③ 季羨林：《中國古史應當重寫》，《群言》，1993年第6期。

④ 葉書宗、馬洪林、朱敏彥：《長江文化與中華民族》，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第5頁。

省區。長江流域以其獨特的地貌和廣闊的面積，蘊藏着豐富的自然資源。豐富的自然資源，又為文明的誕生和演變創造了條件。

早在舊石器時代，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在長江流域這片地理環境優越的土地上生息勞作。考古學家們已經在這條大河流經的區域發現了大量中華民族『童年』的遺迹。在長江上游地區的雲南的元謀，發現了距今已有一百七十萬年歷史的元謀人化石，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的屬於猿人階段的人類化石。此外，雲南麗江、四川資陽、湖北長陽，都出土了大量的早期人類化石和他們所使用的石器。這些距今都有十幾萬年至一萬多年了。

目前被學界所認可的長江流域史前文明，大致包括如下幾個地區：環太湖地區，主要由馬家浜文化（有羅家角遺址、馬家浜遺址、圩墩新石器遺址、常州果園遺址等）、崧澤文化（有崧澤遺址）、良渚文化（有良渚遺址、三皇廟村寺墩遺址）等組成；浙江地區，主要是河姆渡文化（有河姆渡遺址、田螺山遺址）；江西地區，有吳城遺址；湖南地區，有炭河里遺址、彭頭山文化、玉蟾岩遺址；湖北地區，有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四川地區，有大溪文化。

長江流域地區進入農耕文明階段的時間非常早，而且相當成熟。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黃河流域，還沒有發現過類似的早於長江流域的文明。這充分突顯了長江流域在人類文明進展過程中的地位 and 作用。

夏商周時期，長江文明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並成長為幾種主要類型，包括三星堆文明、吳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等。文化總是在不斷的交流碰撞中成長，文明也隨之進步。早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就留下了蜀地與中原相互交流的迹象。這就充分表明，沒有任何一個文明是封閉成長的。此外，吳文化是中原的商

周文化和吳地本土文化相融合發展的產物，越文化是中原的商周文化和越地本土文化相融合發展的產物，楚文化是中原的商周文化和楚地本土文化相融合發展的產物。

秦王朝統一中國之後，中華文明進入了一個大的融合期。長江流域早期的各種地域性文化，逐漸向外傳播，進而影響到整個中國文化。與之相應的，其他的文化也通過各種途徑影響着長江文明。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等中國各大古代文明長期相互影響融合，成為中華文明。不過，由於悠久的歷史，長江文明還是打上了深刻的地域烙印，始終保持着自身鮮明的特色。

國家形態的建立祇是文明社會的抽象概括，其載體或者說物化標志，則表現為文字、青銅器、城市、宗教這四大類。^①換言之，文字、青銅器、城市和宗教，這是文明成熟的四項標準。

甲骨文已經被公認為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系較為完整的文字。它主要發現於黃河流域的殷墟。殷商王室將文字刻寫於龜甲獸骨上，用它們來占卜記事。這些文字所記載的內容極為豐富，涉及商代社會生活的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習俗等內容，同時也包含了大量的天文、歷法、醫藥等信息。但是近年以來，學者們認為三星堆出土的一些器物上的符號，也『是抽象化、綫條化的表意文字』。^②這說明長江流域出現文字的時間至少不會晚於黃河流域。

青銅器主要指用銅錫合金制作的金屬器物。青銅器中，除了銅以外，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錫。錫是區別青銅和紅銅的重要依據。錫礦的產地主要分布於雲南、廣西、廣東、湖南和江西，也就是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在黃河流域，祇有內蒙古地區有少量錫礦。北方地區制作青銅器所需要的錫，絕大部分都來自長江流域。

在古文獻中，『城』和『市』是兩個概念。『城』的出現

早於「市」。「城」是指有防禦性圍牆的地方，《墨子·七患》記載：「城者，所以自守也。」^③「市」是商品交換之所，《周易·系辭》稱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④城市最初的形態是村落。在目前的考古發掘中，最早的且形態完整的村落和城市，都存在於長江流域。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所產生的一種文化現象，其主要特點為：相信現實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實體，該神秘力量或者實體統攝萬物，擁有絕對權威，主宰自然進化的決定人世命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包括三個層面，其一為宗教的思想觀念及感情體驗（教義），其二為宗教的崇拜行為及禮儀規範（教儀），其三為宗教的教職制度及社會組織（教團）。

長江流域的先民，很早就開始了原始的宗教崇拜。林河的《中國巫儼史》一書，詳細地總結了人類的早期長江文明的各項輝煌成果，其中涉及宗教文化方面的文明成果有很多，如：以玉蟾岩遺址的「搓草紋」陶器為標志的世界上最早的植物靈崇拜；以彭頭山遺址陶器上的陰陽縷孔為標志的世界上最早的陰陽觀念；以彭頭山遺址陶器上的火靈出入孔道為標志的世界上最早的火靈崇拜；以彭頭山遺址的日月紋陶器為標志的世界上最早的日月崇拜；以高廟陶紋上的火鳳凰圖案為標志的世界上最早的鳳凰崇拜……^⑤

這些早期的神靈崇拜，對長江流域宗教文化的影響至為深遠。中國本土產生的最大的宗教道教，就起源於長江流域。而佛教傳入中國的一條重要路線，也在長江地區。通過對長江流域一些出土佛像的精細考證，我們發現，「就佛的形態姿式、手印、頭光、服飾式樣而言，已具印度佛像的儀軌，且頗為規範。其通肩式大衣，右手作施無畏印，則完全吻合印度西北之犍陀羅早

期佛像的特徵。國內學界一般也都認定這些佛像是我國佛教造像初始期的遺物，因而彌足珍貴。」^⑥長江流域佛教造像的歷史定位，可以通過一組數據加以體現：北方最早的紀年佛像是後趙建武四年（338）金銅坐像，敦煌莫高窟開鑿於前秦建元二年（336），炳靈寺第169窟於西秦建弘元年（420）開始營建。而長江流域發現了延光四年（125）造像，至少領先北方兩百年之久。^⑦根據這些

^① 安志敏：《試論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2期，第20-26頁。安志敏提出：「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屬器和禮儀性建築等要素的出現作為文明的具體標志。」關於文明的標準，最早於1958年由美國學者克拉克洪在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提出。1968年，英國學者格林·丹尼爾寫成《最初的文明》一書，把文明標準普及到全世界。克拉克洪和格林·丹尼爾認為文明有三條標準：容納5000人口以上的城市、文字、複雜的禮儀建築。國內學者在此基礎上加上了一條標準：金屬器的使用。

^② 段渝：《巴蜀古文字的兩系及其起源》，《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1期。

^③ 吳毓江撰，孫啓治點校：《墨子校注》，中華書局，1993年，第374頁。

^④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第561頁。

^⑤ 林河：《中國巫儼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

^⑥ 胡彬彬：《長江中上游地區的造像與佛教初始輸入的別徑》，《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⑦ 胡彬彬：《論長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響》，《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9期，第117-122頁。

考古成果證明，佛教在長江流域的傳播要早於黃河流域。

以上的四個關於文明的標準——文字、青銅器、城市、宗教，都能在長江流域找到早期的實物遺存。可見長江對孕育中華文明的貢獻非常大。

目前的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四個方面的研究，主要依賴於出土文物，它們普遍都是近幾十年以來文物考古的結果。然而，對流傳於民間村落中的那些實物遺存與文化和文明的關係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太多。事實上，村落是由古代先民在農耕文明進程中，在族群部落的基礎模式上，進而因「聚族而居」的生產生活所需而建造的，具有相當規模、相對穩定的基本社會單元。村落與村落文化的內涵雖不盡相同，但關聯緊密。「文化」是個舶來詞，源自拉丁文「cultura」。這個詞的原始詞意具有耕種、居住、敬神等多重意義。由此可知，村落和文化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而且都是農耕文明的產物。村落是基礎，文化是內涵。同時，村落與村落原住民又是文化載體，文化又因載體不斷傳承和衍生。因而，我們現在將眼光轉向民間村落，來探討那些承載文明及文化成果的實物遺存，就顯得尤為必要。

對於文明的四個標準，我們單獨提出對宗教進行研究。這是因為，有關古代文字、青銅器及古代城市的研究，已經有大量成果問世。對古代宗教的研究，雖然也有汗牛充棟的著作，但是多表現為對宗教的形成及其宗教義理的探討。對於宗教的另一個方面的實物遺存，即宗教藝術的研究，則大都停留在唐宋之前的佛教造像及壁畫的研究上。對於宋代以後的宗教藝術，尤其是存在於長江流域村落中的宗教遺存的研究，諸如水陸畫、道教造像及造像記，則幾乎處於缺失的狀態。作為人類文明的四個標準之一的宗教，其遺存於村落之中的重要物證及其所反映的藝術學、民

俗學信息，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和研究。

事實上，在明清時期的民間信仰中，以道教、佛教為主的長江流域宗教，已經和民俗文化融為一體。道教本來就興起於民間，包含了上古時期的鬼神崇拜、巫史文化、民俗傳統、方技術數、道教思想等內容；而由印度傳入的佛教，在後來的本土化、世俗化、民間化過程中，也越來越成為民眾生活中的一部分。即使在科學發展的今天，大量的民眾在遇到升學、疾病等生活中的重大事情，仍然有去寺廟燒香、抽籤的風氣。在民間，宗教成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而大量的傳播宗教教義的雕塑、繪畫、建築等藝術形式，則成為民俗藝術的一部分。越是深入研究長江流域明清以來的宗教藝術，就越是能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長江流域村落中的這些大量宗教與民俗相結合的藝術遺存，正是對出土宗教文物及摩崖造像等一系列宗教藝術的補充。村落文物與地下出土文物，共同組成了長江流域包含了民俗文化因素的宗教藝術。

基於此，我們特意編撰了這一套「長江流域民俗文化與藝術遺存」叢書。我們的研究對象，主要為明清時期的實物，而且祇集中於民俗文化與藝術中與宗教相關的一部分，即與道教、佛教相關的藝術，包括長江流域道教造像、長江流域道教造像記、長江流域佛教造像、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記、長江流域宗教器物、長江流域宗教建築、長江流域水陸畫和長江流域寫經寶卷，共八卷。

一、《道風遺韻》，主要涉及長江流域道教造像。道教造像是指造於廟堂、石窟等供道教信徒奉祀的神像。長江流域開鑿的道教大型石窟造像，遠遠超過了黃河流域。這是目前道教造像的主要研究對象。但是在本書中，對此祇是進行了文字性的整理，而將主

要的視角放在小型的木雕或者泥塑造像的研究上。這些道教造像形態較小，材質普通，但是無不寄托着民眾對生活的美好祝願。

二、《祈福禳災》，主要涉及長江流域道教造像記。造像記，有時候又被稱為『造像願文』。長江流域道教造像記以紙質或者絲織品為載體，封存於造像的體內。撰寫的內容主要包括了以下六個方面：造像者籍貫和居住地址、造像者身份、造像對象、發願內容與造像原因、造像或者開光時間、造像工匠或者造像記書寫者的姓名。它們與黃河流域的敦煌及關中地區的造像記相比，格式上有了很大的不同。由於敦煌及關中地區的造像記以宋以前居多，長江流域發現的造像記以明清時期為主，所以我們也將黃河流域的造像記視為宋以前的風格，而將長江流域的造像記視為明清風格。黃河流域造像記與長江流域造像記之間有一條明顯的由簡至繁、由粗漸精的發展脈絡。不僅道教造像記如此，佛教造像記也是如此。除了像尊名號的不同之外，佛教造像記和道教造像記之間，並沒有其他明顯的形式差異。

三、《像影迴光》，主要涉及長江流域佛教造像。佛教傳入中土已經有兩千多年，佛教造像伴隨着佛教的傳播而擴展，也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演變，成為佛教在普通民眾中流布的主要方式。佛教因而也被稱為像教。在長江流域，佛教造像石窟主要集中在上游的巴蜀地區，但是這些不是本書考察的重點。跟長江流域道教造像一樣，本書也將視野集中於小型的金屬造像或者木雕造像，時代也以明清造像為主。

四、《祈願延綿》，主要涉及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記。關於佛教造像記，清代人王昶在《金石萃編》中已有評述：『綜觀造像諸記，其祈禱之詞，上及國家，下及父子，以至來生，願望甚夥。其餘鄙俚不經，為吾儒所必斥。然其幸生畏死，傷離

亂而想太平，迫於不得已，而不暇計其妄誕者。仁人君子，閱此所當惻然念之，不應遽為斥詈也。』^①目前的造像記研究，主要歸屬於金石學的範疇，學者普遍考察其書法價值，很少關注其文字內容。長江流域中的佛教造像記跟道教造像記一樣，也以紙質或者絲織品為載體，封藏於造像體內。雖然多為下層民眾書寫，書法價值無法跟長江流域道教造像記相比，但其中所包含的大量民俗文化信息，却不可替代。本書以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記為考察對象，在學術界尚未多見。

五、《器以載道》，主要涉及長江流域宗教器物。宗教器物又稱為法器、佛具、法具或道具。廣義而言，凡是在道觀寺院內，用於祈請、修法、供養、法會等各類宗教法式的器具，皆可稱之為法器。以用途來區分，大約可分為莊嚴具、供養器、報時器、容置器、携行器及密教法器六種。宗教中的器物承載了太多的宗教文化意義，同時，也具有很強烈的民族裝飾風格。《器以載道》一書中，列舉了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及道教三大宗教的法器。

六、《法門妙築》，主要涉及長江流域宗教建築。流傳於華夏大地的本土宗教建築，以寺、廟、祠、觀、庵等為主，它們如同一個個容器，以其巨大的感召力，將進入其間的民眾置入其特有氣氛的控制之中，使其靈魂找到一種皈依感。宗教建築經過

① 王昶：《金石萃編》，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671頁。

了數千年的發展和演變，在宗教教理教規的浸染熏陶中，與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建築相結合，形成了具有一定程式的建築形式。相對其他藝術形式而言，宗教建築的地域性最無可爭議。該書的作者經過長時間的實地考察，拍攝了大量圖片，才彙成此書。其中的艱辛，難以爲外人所知。

七、《丹青教化》，主要涉及長江流域水陸畫。水陸法會是佛教寺院爲超度亡靈、普濟水陸一切鬼神而舉行的一種重要佛事，自金代至元、明、清時期盛行，至今不衰。它是「三教合一」大背景下產生與發展的民俗現象。水陸畫就是在這種水陸法會上所供奉的宗教人物畫，內容豐富多彩，具有濃厚的民俗性特徵，表現出了歷代民間繪畫事業的發展和特色。目前的水陸畫研究對象，都集中於黃河流域地區；對長江流域水陸畫的研究，才剛剛起步。

八、《經卷遺存》，主要涉及長江流域寫經寶卷。大乘佛教特別強調受持、讀誦及書寫經典的功德。《佛國記》中記載：「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①佛教認爲寫經是一種修行，抄寫之前需要發願、盥洗理衣、沐手敬香。每抄寫一段就要停下來拜，虔誠之至。抄寫完成後念一段咒語，而後才將其供奉起來。而後，民間道教也有寫經的習俗。寶卷是由唐代寺院中的『俗講』演變而來的一種說唱文學形式。內容有佛經故事、勸世文、神道故事和民間故事，其基本傾向都是宣傳因果報因和修道度世，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長江流域的寫經及寶卷，伴隨着佛教和道教的傳播，留下了大量的遺存，成爲我們研究宗教在民間傳播的珍貴資料。

值得強調的是，我們研究民俗文化和民俗藝術，應該離開書齋，進入田野進行考察。因此，湖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

心幾十年如一日，不斷地收集與之相關的文獻資料及實物遺存。本叢書所收錄的所有水陸畫、道教造像記和佛教造像記的實物資料，全部都來自湖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部分寫經寶卷、宗教器物、佛教造像和道教造像，也都得益於這一龐大收藏體系。唯一依賴於圖片資料的，祇有《法門妙築》一書。但是這本書的所有圖片，也都由湖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組織課題組進行實地拍攝，爲第一手資料。

因爲我們是首次對這一課題進行系統考察，因此在很多方面都尚未進行深入研究，而僅停留於資料的整理歸類。叢書的不足，顯而易見。但資料的收集和整理，是每一項課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和前提，缺乏這一過程，所有的研究都是空中樓閣。我們整理出版這些資料，正可爲將來更進一步的研究提供重要支撐。

對長江流域文明中的民俗文化與藝術的研究而言，本叢書的出版可謂微不足道，但對該課題的研究而言，總歸是聊勝於無。希望本套叢書的出版能够拋磚引玉，喚起更多的學者加入到『長江流域文明』這一宏大課題的研究中來。

2013年5月

① 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7頁。

目錄

上編 佛教造像記綜論

001

第一章 佛教造像記的一般程式

006

一 發願者籍貫和居住地址

006

二 造像者身份

007

三 造像題材

007

四 發願內容與造像原因

008

五 開光時間和發願時間

011

六 造像工匠及造像記撰寫者姓名

011

七 裝塑佛像捐資

012

第二章 佛教造像記中佛道不分現象

014

一 夾雜符篆內容

014

二 五行圖的出現

015

第三章 佛教造像記所見民衆信仰對象

018

一 觀音信仰

019

二 藥王菩薩信仰

025

三 佛陀信仰

027

四 聖帝界蓋天古佛信仰

028

五 祖先信仰

029

第四章 佛教造像記所見民衆信仰特點

030

一 世俗性

030

二 實用性

032

附圖 佛教造像記獲取與裝裱流程

034

下編 圖版與釋文

035

上編 佛教造像記綜論



佛教自漢朝傳入我國，其造像藝術，於南北朝時期趨於成熟，同時出現依附於佛教造像而存在的佛教造像記。每尊造像的功能，在造像記中都有記載，佛教造像與造像記，是一種共生關係。造像記一般存放於造像的背龕內，或是銘刻於造像的臺座或背面。內容方面，有純文本形式的，有圖文并茂的，具有極其珍貴的文獻研究價值。書中論述的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記，主要為來自民間的紙質版本，發願者多為廣大民衆。長江流域的民間造像，多是虔誠信衆為發願而造，具有唯一性，一尊造像對應一卷造像記。書中的造像記，均來自課題組長期的田野考察所得，未經過任何的加工處理，因而更具真實性，確切地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間民衆的信仰觀念及其生活理想。

『造像立碑，始於北魏，迄於唐之中葉。大抵造像者，釋伽、彌陀、彌勒及觀音勢至為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石窟，或造佛堪（或作龕），或造浮圖。其初不過刻石其後，或施以金塗彩繪，其形模之大小廣狹、製作之精粗不等。造像或稱一區（或作塢、軀），或稱一堪，其後乃稱一鋪。造像必有記（記後或有銘頌），記後題名。昶所得拓本計自北魏至隋百餘種，則其餘之散軼寺廟塔院者，當不可勝紀也。嘗推其故，蓋自典午之初，中原板蕩，繼分十六國，沿及南北朝，魏、齊、周、隋以迨唐初，稍見平定，旋經天寶安史之亂，干戈擾攘。民生其間，蕩析離居，迄無寧宇，幾有尚寐無訛，不如無生之嘆。而釋氏以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上昇兜率天宮之說誘之，故愚夫愚婦相率造像，以冀佛佑。百餘年來，浸成風俗。釋氏謂彌陀為西方教主，觀音勢至又能率念佛人歸於淨土，而釋迦先說此經，彌勒則當來次補佛處，故造像率不外此。綜觀造像諸記，其祈禱之詞，上及國家，下及父子，以至來生，願望甚賒。其餘鄙俚不經，為吾儒所必斥，然其幸生畏死，傷離亂而想太平，迫於不得已而不暇計其妄誕者，仁人君子閱此所當惻然念之，不應遽為斥詈也。考造像之人，官職、姓氏、地名有資考證者，悉已分疏。』^①

佛教造像記是信衆表達佛教和世俗心願的，如禳災、祈福及頌佛等。從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所藏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記內容

來看，人們的功德活動或是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題材等，在造像記中都有體現。這些造像記，記錄了當時民衆造像的原因和祈願內容，對於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尤其是宗教、民俗、藝術等諸多領域，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

佛教造像記最早見於石材質或是金銅材質的造像上，常見於石佛寺石窟造像的旁邊，刻有造像的年代、地方、信士姓名、發願內容等。直至現在，很多人對造像記的認識，還都停滯於此。

『開窟造像時，往往在像的旁邊或像身鐫刻銘文，將造像人的心願附記於此，即造像記。造像記用來記載造像的時間、造像主的身份、造像題材、造像動機、造像對象、造像人的願望等。造像記長短不同，詳略有別，長則數千字，絕大部分非常簡單，祇有姓名或年月、姓名等十幾個字。』^②這一概念，祇是涵蓋了一種造像記的概念，即石窟造像記。比如郴州石佛寺的寺內崖壁上，刻在佛像旁邊的造像記《募緣施財記》：「元至正元年立，大明

國湖廣郴州永豐，吉□祠下立君□，財信士志鳳，意□念志鳳，二個之蹇立特發減，殿俺唐侍奉焚香……信士……佛，正德十六年二月初一日長，祭志鳳，天高任鳥飛，謹自召匠李□□，□綠□，李蓮姑孫郡文。」再下又刻有「爲因求安，果然痊愈，通靈顯應」。事實上，隨着小巧的木材質造像的流行，民間藏於木材質造像腹內或背後龕內的造像記已是頗爲常見。同時，造像記的材

質、形式與內容也更多樣化。

功能主義的文化理論認為，任何一種特質的功能，在於其滿足該群體成員的部分基本需要和次生需要。造像記中所記諸如「乞保人口清吉平安、六畜興旺、男增百福、女納千祥、盜賊遠遁、財糧廣進」等話語皆可看作一般下層民衆對於未來生活樸素的向往。造像記中所記的一部分內容是有關於下層民衆對於美好人生的一種普遍性的期盼，這種普遍性的期盼揭示了民衆對於佛教信仰的訴求。造像記的內容，上及國家，下至百姓，多爲祈禱之詞，祈禱現世來生，具有明確的功利性的願望訴求。因此，依附於造像而存在的造像記，主要是發願者心願之記載，是對造像功能最直接的區分。尤其是在一些相對閉塞的地區，造像記的內容，更是以表述祈願爲主，不再是以記述教理教義爲主，求男丁、福祿、長壽，又或是祈求豐收、驅妖祛疾、避官司兵匪等等。

在人類社會中，宗教意識與社會發展是密切關聯的。伴隨着

① [清]王昶金石萃編（二卷三十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清嘉慶十年經訓堂刊本）

② 李曉敏：造像記：隋唐民衆佛教信仰初探 鄭州大學學報 2007，（1）。

我國經濟重心南移，佛教文化的發展在南方地區也日漸興盛。相比北方高大的石窟造像，長江流域造像的體量感明顯小巧許多。當然，該區域內也不乏石窟造像。我國南方地區的石窟造像，主要分布區域為長江下游以南的江南地區以及長江上游的四川地區。四川地區，其地具備開鑿石窟造像的地理優勢，據統計，全省近50個縣市都有比較集中的摩崖造像，自唐代曾一度成為我國石窟摩崖造像之冠，祇是唐龕在10個以上的分布點就達120餘處。比如『廣元皇澤寺石窟，位於四川廣元市城西二公里嘉陵江西岸皇澤寺，現存石窟乃摩崖造像34處，開窟年代約南北朝晚期，隋、唐、宋都有雕鑿。廣元千佛崖石窟，位於廣元市城北4公里嘉陵江東岸，在今川陝公路上，現存石窟南北長200餘米，共有窟龕200餘個。南北朝時期所鑿不多，主要是唐代雕鑿，其他各代也少。』^①後來明清時期的國家統治者及宗教領袖不再鼓勵開鑿大型的石窟造像，石窟造像的活動因失去了政府的支持而走向沒落。與此同時，家居修行與『居士』、『處士』文化流行，民衆的造像與供奉造像觀念發生變化，由過去的寺觀造像與活動供養，逐漸轉變為民間家庭式供奉。因此，造像的尺寸與體量感明顯變小，以方便供奉於家中神龕之內的小巧型居多，同時也便於外出時攜帶供奉，有利於佛教的傳播。

受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長江流域的佛教造像，因地制宜，

充分運用了南方地區的資源優勢，出現了大量的木材質造像。木材質造像，造像工匠們是在木質雕像的背部開口，將造像記放於其中。這樣的做法，既保存了造像記，也有助於造像材質本身水分的蒸發，對防止木質開裂有很好的效果。隨着我國造紙術的發展日益成熟，紙質成本降低，造像背龕內的造像記，多是書寫於紙上。

諸多學者認為，我國南方是印度佛教最早的傳播區域之一，也極有可能是中國佛教造像的萌發地。由佛教的南傳之路分析，南方佛教造像確實引領了中國佛教造像在審美觀上的變化。從四川早期的佛教造像來看，長江中上游地區的佛教造像，在造像的程式、儀軌方面，的確更接近於標準化，應為印度佛教初始傳入我國最早且最主要的區域之一。所以，長江流域佛教造像，作為我國南方佛教造像的代表，無論是在佛教初始輸入的時間上還是其自身特殊的地域文化特色方面，都是我國佛教造像的一大特色。與此同時，佛教造像的附屬物——造像記，也顯得彌足珍貴。本書收錄的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記，發願者多是下層民衆，由此我們更能瞭解民間下層民衆的生活狀態以及信仰觀念，為民族民俗或是宗教信仰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突破口，可以印證、充實很多學科的文獻研究。已有的造像記方面的學術研究，大多是專注於唐以前的，如南北朝時期和隋唐時期。而本書的研究對象，

側重於唐以降，具有學術補白性。

造像記的篇幅，長短不一，我們在田野考察中所獲紙質版本的造像記，多為記載信衆的發願內容，但也有一些造像記，祇是簡單記錄了造像年代或是造像花費，甚至還有些造像記，祇是單純的一張治病藥方。即便是如此，我們仍能結合時間、地域特徵，從中獲取很多的信息，瞭解到供養人與造像之間的功利關係，從而推敲供養人造像的目的。

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與造像記的分布相對集中，多分布於大山臨近之處。以長江中游的湖南地區為例，此地的造像記基本分布於寶慶府（邵陽市的舊稱）、新化、安化及湘鄉一帶。著名的龍山又稱龍王山、隱山，就是在這四地境內。龍山的龍王寺又名慈云禪寺，有寺宇近百間。自宋到民國初，龍王寺發展了周邊地區的很多信衆，除寺廟供奉之外，民間家庭供奉的風氣也很濃厚。因此，湖南造像記集中於此，就不足為怪了。此外，湖南地區發現佛教造像記數量頗多，也與我國南方佛教興盛地之一——南嶽衡山有着密切關聯。『衡山高聳於丘陵臺地之上，山勢雄偉，風景秀麗，是佛教徒修禪的理想之地，高僧活動比較頻繁，並具有較大的影響，衡嶽因之成為江南西道最大的佛教中心。南嶽高僧多是潛心禪定的禪僧。善伏是禪宗四祖道信的弟子，顯慶五年（660），來至衡嶽。他是將禪宗傳入南嶽的第一位高僧。本

淨、懷讓都是禪宗六祖慧能的弟子。本淨於開元初來至南嶽司空山，「閑放自處」，聲名聞於京邑。懷讓於先天二年（713）來到南嶽，天寶二年（743）去世，弘化凡三十年。據稱「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景附，風動川至，今古一時至矣」。傳有人室的弟子6人，其中，道峻住揚州大明寺，神照在潮州，最著者道一，晚「鎮法鼓於洪州」。真正把衡山禪宗推向極盛的是石頭希遷。遷乃青原系禪師，慧能再傳弟子，端州高要人，天寶初始造衡山南寺。初衡嶽有固、瓚、讓三禪師，固禪師即堅固禪師，讓禪師指懷讓，瓚禪師指明瓚，俗稱懶殘和尚，天寶初年來住南嶽。禪僧以外，宣揚淨土的承遠和尚，天寶初年來居衡嶽，也稱彌陀和尚，開始還祇是獨自修行，「居靡童侍，室無斗儲。一食不遇則茹草而過，敝衲莫完而歲寒自苦」。其影響主要發生於唐後期。』^②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記分布情況，除與所在地的佛教興盛地情況密切相關以外，每個朝代造像記的數量也多少不一。一方面這與歷代帝王的在位年限有關，另一方面與朝代距今的時間長短有關。以清代造像記為例，由我們田野考察所獲資料來看，

① 李映輝·唐代佛教地理研究，P119-120，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

② 李映輝·唐代佛教地理研究，P219-220，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

自乾隆時期到光緒年間，造像記數量明顯比清早期多。

造像記經過歷代的變化發展，形式內容多種多樣，但在這些不同的樣式中，亦有規律可循。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記大致有油印和手寫兩種。其中油印文是指雕版印刷的具有固定版式的範文，而手寫文則是在範文的基礎上人工書寫的。油印範文形式，印刷量相對較大，因此不同的年代區間，油印造像記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這段時期內信眾的數量及信仰狀況。這種印刷版造像記的出現，印證了佛教造像記由興起到普及、內容從繁雜不一到出現標準模式的過程。而手寫造像記在書寫的過程中，可以摻進供養人的特殊要求，對範文的一些內容作出修改，因此，自主性更強，內容更加豐富。同時，手寫文，作為一種人工勞動所得的客觀存在，可以反映出當下時代的書寫習慣、書法特色及文風特徵等。

中國早期佛教的傳播，第一個階段乃是漢末西晉，這個時期最能代表佛教教義的佛像，幾乎全分布於長江及運河沿綫一帶。長江流域在佛教的傳播、發展方面，有悠久的歷史。在長江流域，佛教的信眾分布於社會各個階層，佛教的教義、儀式等深深地影響着廣大信眾，成為他們日常生活裏不可或缺的內容。佛教造像記，作為應用面極廣的一種實用文體，信眾可以通過其表達佛教內容或是世俗內容的祈願，為家庭、國家、社會祈願，僧侶

可作造像記，世俗之人也可作造像記。佛教造像記在長江流域的流行，是佛教在民間普及的表現。

第一章 佛教造像記的一般程式

就長江流域佛教造像記來講，常以「今據」開始引出發願者情況、造像題材、發願內容、發願時間等。同時，「今據」也是一個時間界定，意為發願人的發願內容從現在起開始起效。從造像記結構來看，一般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交代發願者情況，包括籍貫、居住地址、身份等；第二部分為造像記的主體，包括造像題材、祈願內容和造像原因等；第三部分是時間和姓名，造像、開光、發願的時間以及造像工匠、造像記書寫人的姓名。造像記內容有長有短，長者有近九百字，短者祇有十餘字，其中以二三百字者居多。

一 發願者籍貫和居住地址

造像記中發願者一般以家庭、家族或個人為單位。一般都有發願者較為詳細的地址記載，具體到省、府、縣、鄉、都、保、甲等。如「湖南省寶慶府新化縣永四桐木沙渡水三處廟王祠下土地」、「大清國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西鄉新凝（寧）三都七甲地

名田莊上祀祭東冲靈官觀山三處廟隍祠下家壇土地」、「大清國湖南寶慶府邵陽縣城南一廂十甲祀祭黃龍廟王陽屬口園土地」、「大清國湖南寶慶府武岡州龍官鄉第二都大地名具魚周小地名唐樑祠祭回龍廟王城隍祠下土地」等。這其中的省、府、縣都是主要行政區域，鄉、都、保、甲等是基層組織單位。山、水、廟王城隍祠下等形式的居住地址則是神界的區域劃分。造像記中所載的造像者居住地址，一般都是同時有官方行政劃界和神界劃界兩種形式。信眾們認為，祇有寫上神界地址，神靈纔可以找到庇佑對象。

二 造像者身份

造像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家庭所有成員，或是連同親屬一起的多個人。造像者姓名按照長幼、尊卑排序。一般形式為：一家之主——妻妾——長子——次子——長孫——次孫——內戚——姻親。在長江流域的很多民間造像記中，家庭的女性晚輩是不予羅列的，體現了「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封建禮教。以下列造像記為例：「今據湖南省寶慶府新化縣永四桐木沙渡水三處廟王祠下土地奉 匠雕像信人彭思聰室人肖氏長男孝一二男二一 家眷人等發心雕刻救苦難觀音像一尊 自刻之後乞保家門迪吉人口平安六畜興肥耕農茂盛官非遠殄火盜消除凡曰未言全叨庇佑謹言 皇上戊戌年十月

初五日開光大吉（原文此處有符）龍塘村處士吳文貞字六信□」。羅列有長子、次子，而不是以長子夫婦、次子夫婦形式出現。另外，此造像記為印刷與手寫相結合的形式，縣以下地名「新化縣永四桐木沙渡水三處」，發願人「彭思聰室人肖氏長男孝一二男二一」以及造像題材「救苦難觀音」為手寫體，其餘文字和符均為印刷體，反映出佛教造像記的通用程式結構。

無論是個人還是其家眷都參與的祈願，關注的焦點大多是現世利益，為家人或是已故親人祈求平安健康、無災無難。相比之下，很少有祝福政權穩定、國家興盛的。

三 造像題材

造像題材，是指供養人所造之像的類型，諸佛造像或是菩薩造像等。造像題材在造像記中，一般都有記載。一定時期一定地域範圍內，信眾的造像題材趨勢與當時當地人們的民風民俗、信仰情況等密切相關。

在長江流域尤其是長江中游地區的佛教造像記中，可以發現，記載着造像題材為觀音菩薩的造像記數量頗多。造像記中常見有「南海觀音、大慈觀音菩薩、觀音聖像、救苦觀音菩薩、觀世音菩薩、觀音大士神像、大慈大悲靈感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大悲觀音聖像、大慈悲觀